

# 第一章 中国周边政治及军事安全环境

## 第一节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变化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取决于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周边力量中心的组合状况，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力对比，中国和各国的安全政策以及政策的相互作用，这几个基本因素的发展变化。一个总体上保持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实现中国所确定的国家总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

### 一、中国现有的周边安全环境形成的条件

中国现有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对外政策调整和近十年来国际关系变化的条件下形成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对周边国家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为特征的冷战结束。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使中国这二十多年来得以享有远比建国后 30 年为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更大的重视，并为中国同亚太地区各国不断增进合作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前苏联 / 俄国这几个周边大国长期存在的对抗关系宣

告结束，开始或已经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某种伙伴或合作关系；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关系均已实现正常化并且程度不同地逐步得到增强；再度发生冷战时期曾使中国深深卷入的那种大国对抗和地区性国与国间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减小。那么，在 21 世纪头一二十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这一相对稳定与安全的周边环境呢？

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和地区形势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我国安全环境的新变化。第一，从 1996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加紧谋求建立一种它可处于支配地位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它以加强美日安全合作为轴，力求形成一种分层次的地区安全网络。美国在 90 年代末最后确立了它在冷战后的新全球安全战略概念，包括亚太地区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美国和日本的地区安全战略调整已告一段落，美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盟或双边军事合作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这些双边安全合作安排或多或少地都含有制衡与防范中国的考虑。对于美国新战略概念中所包含的某些内容和举措，有些亚太国家表示认可，乃至在不同程度上采取配合态度。第二，亚太地区出现一些热点问题，引起国际关注。除了原有的热点，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中亚、西亚以至东南亚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危害突出了起来。同时，围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在朝鲜半岛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第三，亚太地区各国的安全关注，不少与“中国威胁论”有关。其中包含三个因素：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因而改变着地区的力量平衡；近来，外界对中国因进一步深化改革可能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新矛盾的估计偏高；台湾海峡两岸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地区各国对中国存在着一种疑虑和防范心理。第四 始于 1997 年下半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原有的东亚发展模

式受到质疑，暴露了受危机打击各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迫使它们加快进行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看来，这些不利的新发展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十多二十年中，中国将面临一个较上世纪 90 年代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周边环境。

但是，近来出现的这些新的不利发展还不致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二十多年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首先，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 防范、牵制不等同于敌视、对抗。外界 尤其是美国军方 在谈到中国时即使使用了“ 敌手 ”或“ 主要潜在威胁 ” 这样的字眼，其含义也已大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相互明确界定的“ 敌人 ”或“ 威胁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注意力仍将集中于本身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这使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依然较好。周边主要国家继续把发展和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列在各自外交的首要议程上，没有也不会形成地区各国联合反对中国的局面，基本上不会出现某一国或某一国家集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局面。也就是说，尽管面临各种严峻而复杂的挑战，在 21 世纪初叶，中国和周边大国的关系再次出现敌对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周边形成的相对有利的安全环境，反映了冷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关系基本特征。概要地讲，这些特征包括： 1. 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国与国之间的地区战争仍有可能发生，但是人类流血冲突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家的内乱内战以及外界对它们的非法武装干涉，还有跨国恐怖主义活动。 2. 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但进程时快时慢，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 3. 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作用改变，但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全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新

挑战。4. 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在相当时期内还可得到保持，支撑着它的霸权主义野心。 5. 在东西方对抗结束之后，以及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作用下，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主导性作用。 6. 与冷战时期相比，同时相对于经济和军事安全因素而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弱化。 7. 冷战时期东西方大国间尖锐对立的敌对关系发生变化，在各个大国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争斗的状况，相互关系在时有起伏下，相对稳定。 8.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它们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争夺对象，转变为发达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争取与合作的对象。 9. 各国普遍出现优先考虑本国利益的倾向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发展，对各国政府处理内外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大。

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既反映了上述这些基本特征，也有其本身的特色。本地区从 90 年代后期以来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有三个问题比较突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后，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进程仍在继续发展，各有追求的地区力量中心在地区事务中进一步自主发挥作用；在力量对比变化和各国政策的作用下，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有所加强，若干国家对美国的借重有所增大，相形之下，中国在本地区的地位虽进一步得到改善，却日益成为一些主要大国的融合、牵制与防范的重要对象；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世界对亚洲的安全关注进一步加强，安全问题在地区事务中的比重也有一定的提升。这三个方面的发展，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同时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

## 二、中国遭受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前景

在亚太地区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国与国战争的危险并未增

加，中国几乎不面临遭受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前景。

首先，尽管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总的来看，亚太各国集中精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与谋求相互间的合作，仍然是地区形势发展的主流。对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国家内部——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民族或宗教等领域中的动乱因素。如何应对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实现或恢复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社会稳定，将是它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而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则是区内所有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在维护和保持一个和平与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地区各国具有根本的共同利益和基本的共识。

其次，虽然中国存在因台湾问题而被迫卷入武装冲突的危险，因此而出现针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这种可能性却很小。

自1999年春夏之际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以来，美国是否会援引科索沃战争的先例，对亚洲的各种内部冲突特别是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在中国的学者间一直存在着争论。本文认为，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有着特定的需要和目的：对美国而言，是企图确立在其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的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对西欧来说，近期是为了阻止难民大批涌入，维护欧洲东南翼的相对稳定，长远考虑是为推进全欧一体化进程减小障碍；对北约而言，则是为了使其新战略概念在欧洲得到一次实践的机会，从而显示北约在冷战后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仍旧无可替代。西方国家有评论曾公开宣称要铲除“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这也可能是考虑之一。人道主义和价值观因素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北约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北约高举人道关怀旗帜，部分地是为免受“师出无名”的责难。在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一直在进行反思。它们一再表示，科索

沃战争不会成为北约今后采取干预行动的蓝本。看来，今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会完全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在对特定国家采取具体的军事干预行动时将会采取有选择的做法，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具体的情景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来决定是否及如何进行干预。事实上，尽管大肆批评俄罗斯的车臣战事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考虑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采取科索沃式的新干涉主义军事行动。

而且，亚太地区也不具备采取科索沃式军事行动的条件。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亚洲的战略重要性次于欧洲。在安全机制上，美国通过双边军事联盟编织的安全网，行动能力远远比不上北约。在冷战后的安全概念问题上，美国的亚洲盟国确实已在较大程度上与美国存在着共识。但是，就连美国的欧洲盟国都严格区分全球化安全概念的采用和全球性安全任务的承担。不少评论认为，在科索沃，由于遗留的问题既多且杂，就连再次在欧洲采取类似行动的可能性都已经不大，在亚洲就更加不可想像了。让亚洲国家去为捍卫某种基本上属于西方的理念而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去干预一国的内部事务，并不符合亚洲的传统和现实情况。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已纷纷表示它们的安全关注范围应从双边扩至全地区以至全球。但当涉及新干涉主义的军事行动时，在目前以至今后相当时期内，这种表示看来将基本停留在纸面上。与一体化程度较深的欧洲不同，亚太地区的力量中心既多，它们的利益和主张又存在着更大的多样性和差异。美国及其亚太盟国要采取任何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军事行动，必将在外部环境中和各国国内遇到更大的阻力。

台湾问题是惟一有可能使美国军事卷入从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问题。当前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介入，重点是担心海峡两岸关系激化而爆发冲突。在和平统一的前景没有全然丧

失、中国还没有必要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美国得不到借口独自或联合盟国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今后虽然不能排除因台湾分裂势力铤而走险而使中美两国发生某种形式的军事对峙以至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国遭遇大规模外敌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 三、亚洲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引起世界安全的关注

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相对有所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将在世界上受到较多的安全关注。

前 10 年，在欧亚两洲交接地带战乱不断，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紧张军事对峙下欧洲长达 40 年的相对稳定局面。近几年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原有的武装冲突渐次平息。在波黑和科索沃发生的激烈军事冲突先后结束。巴尔干地区局势虽远不稳定，再次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却有所减小。与欧洲的形势相对照，亚太地区从冷战时期主要局部战争集中，转到冷战结束后十多年的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后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则有可能增加，特别是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成为地区安全的新破坏因素。

在中国广阔的周边地区，从北部的俄罗斯、东北部的朝鲜半岛，到南翼的东南亚和南亚，再到西南亚的阿富汗和西北部的中亚，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在若干国家内部，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政治和社会动荡，领土分裂活动活跃，宗教和族群冲突迭起，或者领导人无序更迭等不稳定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作为地区力量中心各国的内部动荡或冲突，都有可能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此外，中国周边地区不少国家相互间存在着有争议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个别国家之间甚至存在着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

中国周边的几大潜在或现实的热点，90年代以来有的在升温。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争端不时兵戎相见，近期内和平解决希望不大，而印巴两国相继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一现实，更增加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危险性。

朝鲜问题在冷战后一直被视为亚太地区最严重的热点问题。在美国和日本官方公开发表的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分析中，多年来都以朝鲜问题为本地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1998年和1999年，朝鲜半岛一直事端不断，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局势。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半岛局势逐步发生转变，出现了走向缓和的势头。继1999年9月承诺暂不发射导弹之后，朝鲜多方位地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不仅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接连主动采取外交行动，还提出要求加入东盟地区论坛，2000年4月又同意与韩国举行首次首脑会晤。6月15日结束的会晤取得了超过外界原先一般预想的成果，被普遍认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克林顿政府在对朝鲜政府的稳定性作出了基本肯定的判断这一前提下，进而作出对朝鲜增进接触减弱遏制的政策。朝韩首脑会议后，美国已部分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再称朝鲜为“无赖国家”。但是，布什政府2001年1月上台后没有继续前任的许多做法，反而明显后退，2002年进一步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朝鲜则采取以硬对硬，甚至比美国更硬的方针。这就使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紧张化和复杂化。今后发展再次充满变数。

随着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也在增加。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随着台湾问题上变数的增加，外国的关注增大，准备在必要时进行干涉的图谋有所显露。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已经在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并为长期

维持两岸分离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安全举措，使两岸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政治方面，美国提出“中程协议”<sup>①</sup>。其要点是：为了缓和两岸间的紧张状态，保持海峡局势的稳定，两岸现状 50 年不变；台湾方面不宣布独立，大陆方面宣布不对台湾动用武力；美国自己并在国际上进行动员，对台湾独立不予承认，这样大陆方面也就没有了动武的理由。美国围绕“中程协议”的活动仍在进行，而且已得到美国官方的认可。1999 年 3 月 24 日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在华盛顿一研讨会上称，两岸间的对话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全无协议和全面协议之间可以有许多中间协议。在 2000 年 3 月台湾举行新领导人选举的前后，美国政要更是频繁活动于台海之间，以确保台海现状得以维持。

在安全方面，美国除继续对台军售外还考虑将台湾包括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以增强台湾防范大陆动武的能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尚未作出最后决定，但也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台湾当局已经在购买具有导弹防御功能的武器，如早先的爱国者 - II 型导弹和 1999 年得到克林顿政府原则批准出售的预警雷达系统等。从目前的趋势看，台湾的反导能力逐步得

<sup>①</sup> 1998 年 2 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此后一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负责人）李侃如提出，两岸先达成为期 50 年的“中程协议”，双方既非中央与省、亦非排他性主权实体之间的关系，双方都不向“一个国家”挑战，最终实现统一。同月，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穿梭于两岸间，在台湾提出，如台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新国家，美国可能不保卫台湾（《华盛顿邮报》1998 年 2 月 21 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提出“有活力的维持现状”一揽子方案：1. 美宣布自己的政策为“一个中国”和“不使用武力”。如台宣布独立，美不会承认或保卫它。但美也不接受动武，因为台湾宣布独立的天折后果改变不了任何东西。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如台坚决拒绝宣布独立的想法，就不反对台享有更大的国际空间实行“一国三制”。3. 台应明确表示断然决定不采取走向独立的做法，增进两岸对话，刺激更大的投资和人员交流（《华盛顿邮报》，1998 年 3 月 8 日）。

到提高这一前景已经出现。

与此同时，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包括台湾，看来也已成定局。美国和日本至今不肯明确说明日美防务合作新指针中有关“周边事态”的具体地理范围。但它们都一再重申，“周边事态”指的是原日美安保条约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如果是这样，则台湾是包括在内的。而且日美两国也迄未排除“周边事态”可以包括台湾地区。其次，日本对“周边事态”提出的六项定义，其中有四项按照日本的解释，可以适用于台湾，即：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争端；日本周边地区即将爆发武力争端；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事态已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发生在日本周边的武力争端已经停止，但是秩序尚未恢复。日本解释说，一旦美国军事干预上述在日本周边发生的事态，并且向日本提出援助的请求，日本自卫队即可根据有关法案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并且配合美军进行搜救活动。

主张维持两岸关系现状、反对大陆对台使用武力（即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已经是美日的基本态度。其他亚太国家也不希望海峡两岸间出现紧张局势。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导弹发射演习，引起过他们的不安，一些周边国家曾表示过关切。此外，台湾除了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近几年还日益被西方国家甚至一些东亚国家在政治上看好。在“人权高于主权”论甚嚣尘上、价值观标准公然成为西方国家奉行新干涉主义重大依据的今天，台湾的所谓“民主化”成为国际上关注以至干预台湾问题的新角度和新借口。

但“9.11”后，由于美国对亚洲次地区安全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台湾问题已不如此前那么突出。

除了这几大热点，南海的领土领海争端依然存在。特别是印尼和菲律宾内部与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有联系的分离活动，不

仅影响地区稳定，也日益引起国际上的关注。2000年5月和6月斐济和所罗门群岛发生的军事政变，使长期比较稳定的南太平洋也一时不那么平静。

#### 四、亚太各国在顺应世界主要潮流方面展开竞赛

亚太各国正在顺应世界主要潮流方面展开竞赛。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亚太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从90年代最后两年的相对下降转为再次上升。

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以各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争取增进相互间的平等合作为重要表现的世界多极化等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过去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亚太地区各国顺应潮流是否主动和及时，决定了它们崛起的快慢和先后。印度从9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上它重点发展信息产业，近几年已使世界对它刮目相看。最近朝鲜也在发生引起外界高度重视的变化。它的最高领导人公开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中国国情，并且较大幅度地调整它的对外政策。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曾大幅度下降。根据1999年4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发展前景》报告，1998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率仅为2.6%。其中“四小虎”和东南亚国家的增长率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分别为-1.4%和-6.9%。一时之间，认为东亚地区已丧失经济活力的悲观论调在国际舆论中大有市场。但事实表明，东亚地区复苏的进程早于也快于原先的一般估计。据亚洲开发银行2000年4月2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韩国在1999年和2000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和7.5%，印度为5.9%和7%，泰国为4%和4.5%，印尼为0.2%和4%，菲律宾为3.2%和4%—5%。世界银行在2000年初发表的一个报告中估计，2002至2008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可达

5%，而亚太地区的年增长率将达 6.3%，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一发展充分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破坏力和修复力，同时也与亚洲各国如何对待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亚洲金融危机促使许多国家反思自己的发展道路。危机本身和个别亚洲国家政权易手，使东亚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亚洲国家自己的质疑。新加坡的李光耀资政还从价值观角度进行了观察。他说，东亚价值观受到了挑战，因为这种价值观体系不奖励创业精神；应该在保持集体主义下提倡个人创新，变靠社会庇护为靠个人努力。在这种新的认识之下，各国大都选择了准备迎接严峻挑战，使自己在经济结构、管理方式以至某些文化传统方面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这一方针。不少国家已提出更新观念和大幅度调整政策的要求。当然，如何化为进一步行动，各国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

日本的小渊首相委托起草，2000年初发表的《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报告》，说信息技术革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未来的日本社会将由分属不同类型、抱各种想法的人们组成，要改变日本人缺乏革新、抱负和主动精神的状况；强调个人权利，使人才不再在集体中湮没，要改变过去长期重平均主义、个人优越表现得不到相应回报的体制；向世界开放，逐步改变移民政策；以英语为国家第二语言等。美国有评论称，报告不啻让日本人不再当典型的日本人，因为它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式整齐划一的传统，去追求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和多元文化主义<sup>①</sup>。但在小渊于2000年1月28日发表的施政纲领中这一报

<sup>①</sup> 约纳森·瓦茨，《从文化根子上动摇日本》，美《商务日报》，2000年1月25日  
雷金纳德·戴尔，《“美国化”有其限度》，《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25日。

告的基本精神已得到一定的体现。通产省主持起草的 21 世纪日本经济产业政策展望，也提出产业要从传统的“自我完结型”向机会、信息和评价等全部开放的“开放与合作型”转变。看来日本是在为又一次历史性转折做思想准备。神户大学教授植松忠博说，使日本经济取得新发展，明治维新时是“以日本精神为体 西洋学术为用”；二战’后是“日本精神与美国技术”相结合；21 世纪将是“日本精神和国际观念”相结合；21 世纪如无视欧美国家奉行的准则就无法经营下去，但这不意味着向欧美、特别是向美式经济体制过渡<sup>①</sup>。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提出的口号是：新千年是人权与民主成为普遍价值观的时代，是知识革命的时代，韩国将成为先进的人权与民主国家<sup>②</sup>。

许多亚洲国家近一年来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迈出新的步子或作出新的表示。印尼在瓦希德担任总统后发生的民主化变化曾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马来西亚近来也强调“人民的安全”和民主问题。马哈蒂尔总理在巴基斯坦政府新任领导人穆沙拉夫于 2000 年 3 月底访马时还对他说，民主虽有各种瑕疵，却仍是政府的最佳形式 已经做了的事（指军事政变）可能有道理 但最后必须回到文职统治和民主，从长远看决不能为成立军政府辩解<sup>③</sup>。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压力，无疑对一些亚太国家产生了影响。但这不等于亚太国家准备全盘西化。它们在某些观念上和西方有所靠近与在行动上对西方亦步

① [日本]《世界经济评论》，2000 年 3 月号。

前总统金大中于 2000 年 1 月 3 日发表的新年献词。

汤姆斯·福勒，《马哈蒂尔在民主问题上向巴基斯坦施压》，《国际先驱论坛》2000 年 3 月 29 日。

亦趋是两回事。例如，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就有不少与西方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却毫不让步<sup>①</sup>。亚洲国家更是各有特色，民主化道路全不相同。它们对外均从本国利益出发，不容许西方干涉本国内政。2000年初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都警告印尼军队不得发动政变，这一行为当即遭到印尼高级军官的指责。瓦希德总统也表示，印尼不会成为外国的走狗<sup>②</sup>。

### 五、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进程将加快发展

随着亚太各国的经济复苏较原先一般估计的要早，亚太地区的多极化进程将加快发展。日本、印度、东盟、印尼、韩国以至澳大利亚分别怀有充当地区强国或主要地区力量中心的抱负。

在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已是多极化现象在世界上出现最早的地区。两极格局解体以来，表现更是较为突出。在这一地区，除了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外，还存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等世界大国、地区大国和地区力量中心。它们都谋求在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繁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复苏为本地区各国谋求成为地区强国或主要地区力量中心的努力注入了新的动力。现在，除了中国、日本、东盟这几个早就得到公认的地区力量中心外，印度、印尼、韩国和澳大利亚，特别是印度，也开始在地区内外得到新的评估和更大的重视。

亚太地区多极化出现了两个相对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是

在1999年12月召开的欧安组织会议上，俄高度评价包括新干涉主义理念的《欧洲安全宪章》，但在车臣问题上坚决反对西方干预。

杰·所罗门，《美国加紧支持雅达盟友》，《华尔街日报》，2000年1月24日。

亚太地区各国的综合国力的相对均衡化发展：日本经济多年增长缓慢，中国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印度已在崛起，作为力量中心的大东盟继续走向一体化，其他地区力量中心也都在增长中。二是所有这些力量中心，都正大力谋求在经济、安全、政治和对外作用等各个方面得到比较均衡的发展。各国在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采取的各种举措尤其引人注目。

### （一）日本

日本不仅是亚太地区第一经济大国，也是本地区军费开支最庞大、军事技术力量最先进的国家。从 90 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连年停滞不前，但这并未动摇它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谋求与自己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一直是日本外交的一个主要目标。近年来，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使自己成为世界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努力，开始公开提出要起主导作用。积极准备在整个地区以至世界范围的安全事务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是它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在这一领域它已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来，日本一再表示要把它的关注范围从国内及周边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以至全球，“9·11”后这一意图更是逐步化为行动。早在日本 1997 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就把过去使用的“日本周围军事形势”这一措辞改为“亚太地区军事形势”还进而强调要关注全球的安全结构。小渊内阁在 1998 年初成立后即提出，要致力于把日本改造为“能在国际上做更大贡献的国家”。同年底，小渊又提出要推进“发挥领导作用的外交”。1999 年 1 月 19 日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他又发出“通向世界”、“具备领先世界的气概”等豪言，说“要使日本受到国际社会的尊敬，尽与日本地位相称的责任”。同时，日本再次明确表示，要在地区以至

全球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外相高村正彦 1999 年 1 月间称：“在国际社会加深相互依赖的过程中，日本积极对待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各种问题也是重要的；日本要继续发挥与它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相称的主导作用……在加强现有的国际框架和确立新框架构想时，日本应该发挥主导作用。”<sup>①</sup> 这种“领导”作用既包括在经济上积极参与建立世界经济合作新框架，实现日元进一步国际化，带头发展地区经济合作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包括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维和，介入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推进亚太地区的各种安全合作。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日本积极拓展并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而且，在重视发展与亚太各国的双边关系的同时，日本更加注意通过双边关系来实现日本在地区以至世界事务上的抱负。这一点在日美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和两国防务合作新指针的出笼，日本力图在亚太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日本也明确地把中日关系置于各大国间多边相互作用的框架之中，以及两国要共同关心双边关系以外的地区和全球事务这样的大视野之下。小渊首相在 1998 年 8 月 7 日的施政演说和 11 月 27 日国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均提出，日中作为对全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负有责任的国家，必须进一步扩大与充实面向国际社会的对话与交流，而不是单纯限于双边关系。从 1997 年 7 月桥本首相发表“欧亚大陆外交构想”开始，日本全方位地推进日俄关系，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1998 年 11 月 13 日发表的日俄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莫斯科宣言，申明两国不仅要共同解决两国间现存的问题，而且“要为亚太地区及

<sup>①</sup> 《读卖新闻》，1999 年 1 月 19 日。

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并要在八国首脑会议中大力加强协作。1998年10月金大中总统访日，宣告日韩两国间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从此告一段落，确立了面向21世纪目光超越双边的“日韩新时代”伙伴关系。日本积极谋求在多边框架下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小泉首相2002年还出访朝鲜，大力谋求双边关系的正常化。日本和东盟的关系也同样着眼于全亚太地区。1997年1月桥本首相在东南亚之行中提出“南下战略”，呼吁东盟与日本之间举行定期首脑会晤，讨论安全、贸易及援助等问题。1998年1月，日本防卫厅表示要扩大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安全保障对话，尤其要加强与菲律宾、泰国、印尼和越南的交流。2000年1月，小渊首相出访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旨在全方位地发展同“大东盟”的关系。日本对东盟关系的重点不限于双边经贸，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与全球问题。2000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先后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将同这两国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此外，日本还在同印度增进地区防务合作。

近年来制约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已日渐削弱。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内外形势变化，一贯反对日美同盟、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社会党（现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日渐减弱，保守派和右翼的势力却逐步上升。日本的民众情绪也在变化。海湾战争中出了钱却仍然受到批评的经历使众多日本人认定，要成为政治大国仅有经济实力是不够的。90年代以来连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的民族主义抬头。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发展计划使日本产生比较强烈的不安全感，进一步给它提供了加强本国军事建设的理由。在1998年的朝鲜“导弹”危机之后，日本要求在军事上更加自主的呼声日益增强。在朝鲜用火箭发射卫星之后，日本宣布要在2003年以前自行设